

晚清民国“病毒”知识的翻译与引介： 知识翻译学视角

缪 蓬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 200093)

摘要:知识翻译学构想的提出为学科知识翻译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晚清民国时期西医知识在我国的翻译与引介很好地反映了知识翻译中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和知识建构三者的关系。本文以该时期“病毒”知识翻译为例,基于词典、报章及书籍等多种文本资料,审视知识翻译中的语言转换现象,考察“病毒”话语塑造的不同阶段,描写“病毒”知识建构的过程。经分析发现,现代“病毒”知识在我国的翻译与引介是西医知识在我国生产与再生产的缩影,也是西医知识翻译推动我国医学现代化的缩影。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翻译史;病毒;术语翻译;话语塑造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22)04-0022-11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22.04.003

1. 引言

杨枫(2021)的知识翻译学理论甫一出场,便在学界受到一定的关注,引发了一系列讨论(例如李瑞林 2022;庞秀成 2022;覃江华 2022)。知识翻译学的出发点是知识的理解、迁移与传播,研究对象为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和知识建构的关系,其目的是为各学科的知识积累与转换提供理论和方法(杨枫 2022)。20世纪中叶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各类知识引介、演化及接受的研究始终保有较高的关注,Foucault(2002)的“知识考古”强调对具体概念的历时性考察,Said(1983)的“理论旅行”则延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平面。上述研究的共性是将具体的概念或术语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其传播与演化透视不同学科知识在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文化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而知识翻译学为该类研究提供新的思想。

学科知识均以翻译的方法积累,其思想发展也均以翻译的形式呈现(杨枫 2021)。对近代入华的现代医学而言,其知识积累及思想发展均体现在对特定

作者简介:缪蓬,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概念史、翻译史、话语研究。电子邮箱:miaopeng@usst.edu.cn

* 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复杂系统理论视域下美国大报中金砖国家概念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编号19YJC740004)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信息:缪蓬. 2022. 晚清民国“病毒”知识的翻译与引介:知识翻译学视角[J]. 当代外语研究(4):22-32,45.

概念进行的翻译实践中。知识翻译学特别关注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产变迁,科学分析不同语言对不同知识的选择、加工和改造(杨枫 2021),而现代医学的在华传播也正是地方性医学知识逐步成为世界性知识的缩影。本文以近代“病毒”概念及相关知识在我国的翻译与引介为例,对汉语如何消化、生产和塑造自西而来的医学新知进行考察,探索知识翻译学在学科知识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也为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科学概念跨际实践的研究提供借鉴。

19 世纪初,来自西方的新教传教士通过“借医传教”的特殊手段,将现代医学传入我国(陈倡华、陈丽云 2021),大量现代医学概念随之进入汉语言文化体系(缪蓬 2022)。知识翻译学将自然科学知识的翻译视为“来料加工”(杨枫 2022:2),本文以晚清民国时期“病毒”知识的翻译为例,呈现自然科学知识翻译不亚于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翻译的复杂性,并回答如下问题:(1)“病毒”知识的翻译蕴含何种语言转换过程?(2)“病毒”话语的塑造如何反映“病毒”知识的建构?(3)“病毒”知识翻译中的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和知识建构有何种关系?

2. 聚焦特定概念或术语的知识翻译史研究

在对“病毒”个案加以探究之前,我们先对聚焦各类概念或术语的知识翻译史研究加以梳理。20 世纪以来,各学科领域对关键概念、核心术语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汗牛充栋,这些研究虽未用“知识翻译学”或“知识翻译史”等名称,但均跳出了翻译研究的一般框架,通过对特定概念或术语在不同文化间的传输、流通与接受加以历时性考察,透视相关学科知识跨文化传播中的特征。例如,方维规(2000)对“议会”“民主”“共和”“自由”等概念在我国汉译、嬗变及使用情况的探究,金观涛、刘青峰(2009)对“权利”“公理”“社会”等概念在我国引进、演变及定型过程的研究,以及冯天瑜(2006)对“封建”一名的考据均是较典型的政治、社会知识翻译史研究。哲学、法学领域的此类研究亦有丰硕成果(熊月之 2011;屈文生 2012)。医学领域的同类研究相对较少,如高晞(2021)对近代汉语“传染病”相关概念的形成与确立所做的系统梳理。

上述从不同视角开展的知识翻译史研究反映了各学科知识翻译的两大共性。其一,知识翻译中的话语塑造具有阶段性。^①第一阶段为本土知识准备期,本土传统的相关概念所塑造的传统话语为新概念、新知识的传入提供话语体系。第二阶段为外来知识导入期,由于新知引入本土的语言文化体系,传统的话语和新来的概念相遇、碰撞乃至交融,塑造具有强烈本土色彩的错位话语。第三阶段为新旧知识过渡期,随着新知不断涌入,相关概念的话语也呈现出专门化、精细化特征。在该阶段和前一阶段,围绕新名词所塑造的新话语同新概念并不完全对应,两者的对应发生在第四阶段,即翻译概念形成期,这一阶段一系列本土译词被用于对新概念的系统引介,随着新知的系统导入,新概念逐步确立。

其二,知识翻译研究具有三个层面:术语层面、概念层面与知识层面。知识

翻译学视域下,以术语为观测对象的研究无法绕开术语背后的概念,对其传播、容受与变迁的经过不闻不问;以概念为观测对象的研究也无法绕开用以指称这一概念的术语,对术语、概念所进行的历时性考察最终服务于对相关系统性知识在不同语言间发生、迁移与流通的描写和解释,故而这三个层面是相互渗透的。本文对“病毒”的探讨始于术语层面对“virus”一词在近代英汉词典中译文的考察,展现现代“病毒”概念传入我国之初的语言转换过程,并进一步通过不同类型的文本语料观测概念层面“病毒”话语不同阶段的塑造过程,最终厘清“病毒”知识翻译中三者的关系。

3. “病毒”译史研究现状

关于“病毒”概念传入我国的情况,黄河清(2020:111)在《近现代汉语辞源》中收录了“病毒”词条。根据该词条,“病毒”为日源词,最早见于1900年《清议报》第六十九册《论侵略中国之无谋》:“膨胀热今已盛行于欧洲列国之间,其病毒之亢进也(转引自黄河清 2020:111)。”此处之“病毒”为隐喻用法,且并非对应西医中的“virus”概念,故而并未反映西医“病毒”概念最初传入汉语的情况。《近现代汉语辞源》提供的另两例书证,见于1909年《最新农业教科书》卷四的“至蓄有各种病毒之蚕种”以及1918年《西药指南》上卷的“风湿……为一种病毒”(转引自黄河清 2020:111),也均未体现西医“病毒”概念的翻译。根据魏励(2018)编著的《常用汉字源流字典》,“毒”本义为“毒草”,引申义为“有毒的物质”,因而上述两例所显示的传统意义上的“病毒”,可以理解为疾病所产生的有毒物质,不同于现代医学中的“病毒”。

近年,随着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始有学人对西医“病毒”概念入华史加以关注。黄兴涛、刘鹏(2020)对“细菌”和“病毒”概念最初传入我国的情况进行了追溯,并将两者的引入同我国现代卫生防疫观念的兴起相联系。作者在文中对“细菌”和“病毒”混用概念的情况描写得较翔实,对两者之于国人现代卫生防疫知识形成的影响讨论得也较深入,但对两者具体入华历程的梳理则相对简略。除该文外,目前学界还尚无其他关于西医“病毒”知识翻译的深入讨论。由此,本文将在知识翻译学视域下,运用词典、报章、书籍等文本资料,对晚清以来“病毒”知识在我国的翻译引介加以探究。

4. “病毒”知识翻译中的译词更迭及流变

本节对“病毒”知识翻译中的语言转换过程加以审视。西医“病毒”概念的传入史并不仅是“virus”一词的翻译史或“病毒”一名之词汇史,也是相关知识在汉语医学场域发生、再造及流变的历史。翻译既是符号转换,也是知识生产(覃江华 2022)。“病毒”知识的翻译始于用以指称“病毒”概念的语词由外语向汉语的转换,即“virus”等术语的汉译。对清末民初词典中“virus”等术语译词加以梳理,或可窥见现代“病毒”概念传入我国之初“规范性”的汉语表述,以及相关译

词在其后一个世纪的变换情况。

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麦都思编纂的《英华字典》中就有关于“virus”的词条“virus, of the smallpox”,译作“浆”(见图 1)。此处的“virus”专指天花病毒,早年在“天花”及“牛痘”知识的翻译中有“痘浆”“痘苗”等术语的应用(缪蓬 2018)。20 年后,罗存德(1866;1930)的《英华字典》给出“virus”的英文释义“poison”,并将其译为“毒”,同时列出了“the virus of venereal ulcers”(“疔毒”)和“the virus of small-pox”(“痘毒”)两则例词。邝其照(1899;430)的《华英字典集成》将“virus”译作“脓、疮脓”。可见在 20 世纪以前的英汉词典里“virus”的汉译词并未和现代医学“病毒”概念对应起来,而本土传统的话语体系被用以引介亟待进一步翻译的外来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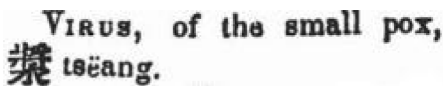


图 1 麦都斯《英华字典》中的“virus”词条^②

进入 20 世纪,英汉词典中始见“病毒”二字同“virus”的对译。博医会发布的第一版《高氏医学辞汇》(原书的标题为“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仍将“virus”译作“毒”(高似兰 1908:383),而颜惠庆(1908:2583)所编《英华大辞典》中的“virus”词条则包含三条释义,其中第一条释义“active or contagious matter of an ulcer, pustule, etc., as of small-pox”注明为医学释义,译为“疮疹之毒水、传染病毒、病毒、脓浆毒(痘毒、痘浆)”,将旧名词同新名词都囊括其中。若干年后赫美玲(1916;1596)编纂的《官话》将“virus”译为“毒、病毒”。自此,“病毒”成为“virus”在英汉词典中的常见对译词(见图 2)。

vi'rus (vi'rūs), n. [L., a slimy or poisonous liquid, poison, stench.] 1. The poison or contagious matter of an infectious disease, 病毒;傳染病之毒質及傳染質; also, vaccine virus, 又指牛痘毒。 2. a Anything that poisons the mind or the soul, (甲) 戕賊性靈之事物。 b Malignity, (乙) 怨毒; malice, 惡意; virulence, 毒恨。 [R.]

《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1928)

Virus 病毒

《百科名汇》(1931)

vir

894

vit

vi'rus (vi'rūs), n. [醫] 病毒, 牛痘毒, 毒。

《现代英汉辞典》(1936)

图 2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英汉词典中的“virus”词条

1949 年,辞典编译委员会(1949:787)编译的《英汉新医辞典》由杭州新医书局出版,这部集当时多部重要医学词典和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成果之大成的辞典将“virus”译作“疢毒、病毒、传染毒、毒”,并给出十则相关例词。同时,这部词典还收录了“virology”词条,将其译为“毒学、疢毒学”,这在当时的词典中是不多见的。同年发布的第十版《高氏医学辞汇》在“virus”译词的处理上则有些差异,

将其译作“[病]毒、传染毒、毒”(鲁德馨、孟合理 1949:424),并未包含“痰毒”,该词疑为辞典编译委员会首创。后者的“virus”词条下也列出了与前者相同的十则例词,但译词略有不同(见图3)。同年发行的还有吴建庵(1949:246)的《袖珍医学辞典》,其中“virus”的对译词为“病毒、传染毒”,下有例词“filtrable virus 滤过性毒”和“vaccine virus 痘毒、牛痘毒”。

上述例证均能表明 20 世纪上叶,“病毒”是“virus”的常见对译,然而这种对译关系并不稳定,具体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仍有一些词典未含指向现代“病毒”概念的译词,如《袖珍英华字典》仍将“virus”译为“毒、毒质”(吴治俭、胡治毅 1935:1006);第二,“virus”的译词有概念混淆的现象。确切地说,这种概念混淆并非发生在“细菌”和“病毒”之间,而是发生在“病菌”和“病毒”之间。“病菌”二字作为“virus”译词出现在黄土复、江铁(1928)编纂的《综合英汉大辞典》和汪侗然(1935)编纂的《综合英汉新辞典》中。在李登辉、郭秉文、李培恩(1946)编的《双解实用英汉字典》中,“病菌”甚至是“virus”的唯一医学上的译词。译词的不稳定是近代我国科学知识翻译中语言转换过程的典型特征,也体现在相关话语塑造的过程中。

virus 疾毒,病毒,傳染毒,毒	virus [病] 毒,傳染毒,毒
一, attenuated 減弱病毒	一, attenuated 減弱病毒
一, Danysz 但尼斯氏毒	一, Danysz 但尼斯氏毒
一, filtrable 濾過性毒	一, filtrable 濾過性毒
一, fixed 固定毒	一, fixed 固定毒
一, humanized 人化痘漿	一, humanized 人化痘漿
一, invisible 超視性毒,濾過性毒	一, invisible 超視性毒,濾過性毒
一, smallpox 痘毒	一, smallpox 痘毒
一, specific 特別病毒	一, specific 特別病毒
一, street 市街毒(癩咬病毒)	一, street 通常毒(癩咬病)
一, vaccine 牛痘毒	一, vaccine 牛痘毒,牛痘苗

图3 1949年《英汉新医辞典》(左)和第十版《高氏医学辞汇》(右)中的“virus”词条

5. “病毒”知识翻译中的话语塑造与知识建构

各类报章和书籍是晚清西学新知在我国引介与“再生产”的重要媒介(章清 2019),因而也是考察其话语塑造过程的重要语料。本节首先基于医学类和大众类报章,对“病毒”话语不同阶段的塑造历程加以考察,并对其反映的知识建构过程加以描写,而后运用医学书籍语料,进一步确认作为翻译概念的“病毒”在汉语医学场域确立的时间。自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叶,与“病毒”有关的旧名词、新名词及其背后的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在近代报章中共现、碰撞并交融,塑造了兼有本土色彩及现代性的“病毒”话语。

5.1 本土知识准备期:传统的“病毒”

“病毒”话语塑造的第一阶段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十几年,该时期的“病毒”话语还只是本土传统的旧话语,不涉及新知的建构。“病毒”并非专为“virus”概念所造的新词,而是汉语原有的名词。当时,“virus”一词在英语中也不常用,故而该阶段汉语报章中的“病毒”一词并不蕴含西医“病毒”知识翻译的

相关线索。当时“病毒”概念在英语中的表述如“minute solid particles(微小固体粒子)”,该表述见于图4中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1880)刊载的文章。^③

Contagion consists physically of minute solid particles. The process of contagion consists in the passage of these from the bodies of the sick into the surrounding atmosphere, and in the inhalation of one or more of them by those in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If contagion were a gaseous or vapoury emanation, it would be equally diffused through the sick room, and all who entered it would, if susceptible, suffer alike and inevitably. But such is not the case;

图4 1880年2月在华发行的英语报章中提及现代“病毒”概念

“病毒”二字在20世纪初的汉语报章中逐步使用,有时也称“传染病毒”。《盛京时报》刊载的“黑鼠病毒”(1906)、《医学世界》刊载的“花柳病之传染病毒说”(顾鸣盛1908)以及同年该刊物刊载的“疟疾(续)”(1908)显示了当时的“病毒”话语主要涉及的三种疾病——鼠疫、梅毒和疟疾,而这三者的病原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病毒”。^④

5.2 外来知识导入期:错位的“病毒”

第二阶段为1915年至1930年。该时期西来的“病毒”知识开始逐步进入汉语,但由于对新知的认识尚不深入,“病毒”话语所用之语词仍有强烈的本土色彩,新概念与旧话语在碰撞中交融。1914年,《进步》刊登的“法国贝士多疗病院二十五年之纪念史”是近代报章中最早提及西医“病毒”概念的文本。文中,作者秋水(1914)介绍了巴斯德对病患“施种狗瘦血清”以“抵抗狗瘦病毒菌”的经过,此处的“狗瘦病毒菌”就是狂犬病病毒。由此可见,“病毒”的概念被冠以“毒菌”的语词,出现了概念和语词的错位现象。

与之类似的是“病菌”概念反被冠以“病毒”之名。例如,《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刊登“苍蝇传带病毒之原因”,指出“苍蝇传带病毒……它们满身都沾染饱含病微菌(逸民1925:12)”。不难发现,作者所谓的“病毒”,实为苍蝇携带的病菌。《美亚期刊》刊登的“身体与病毒”对“病菌”与“病毒”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作者所谓“病毒由病菌而生”的说法反映了文中的“病毒”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病毒”(同上:3)。近代报章中迄今可查最早的使用“病毒”二字指称现代“病毒”概念的例子见于《中华医学杂志》刊登的文章“狂犬病毒之奈格里氏小体得以明了检出之简便迅速法”(佚名1928)。

5.3 新旧知识过渡期:分类的“病毒”

第三阶段为1931年至1935年。在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之间,即20世纪20年代,来自西方的文化和科学观念在我国迅速传播(张大庆2019),为“病毒”知识在我国的翻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正是由于西来新知的广泛传播,当时

的医学话语呈现出专门化、精细化趋势,“病毒”话语体现出明显的分类意识。位于第二阶段和第四阶段之间,这一过渡时期的“病毒”话语并未体现“病毒”一名与“virus”概念的对应,而这一时期关于“病毒”类别知识的传播为此后现代“病毒”知识的系统性建构奠定了基础。

丁惠康(1931:46)在《新家庭》刊登“自然的及接触的病毒”,对“病毒”概念加以界定:“病毒者,一切阻害人体,破坏器官作用之物质也。”紧随其后的是两类“病毒”,即“自然的病毒”和“接触的病毒”。前者例如“砒”“铅”“水银铋铜等制造之物”,和当今所谓之“病毒”相去甚远;后者则指“微生物(即细菌)或原始动物”,它们包括“植物性动物性之二者”(同上:47),名曰“下等菌类”和“原始动物”,两者“均为世之传染病原”(同上:47)。至于“传染病毒之最初起源”(同上:47),丁惠康认为“无从徵考,今亦难于详述”(同上:47)。

《医事公论》刊登“昆虫之媒介病毒”,介绍“昆虫媒介病毒之最显著者”,包括“蚊之传染疟疾”“蝇之传染伤寒、赤痢、霍乱等胃肠传染病”等(佚名 1934:23),文中的“病毒”囊括了原虫、细菌、立克次体,成了这些微生物的上位词。可见当时西医新知在我国的传播已初见成效,昆虫与传染病的关系、微生物的大致分类等话题已进入国人视野,成为大众知识的一部分。

5.4 翻译概念形成期:翻译的“病毒”

20世纪30年代以前,流行性感冒的病原体被公认为是“流行性感冒杆菌”,这一错误的认识直到1933年Smith等发现该病病毒才得到纠正。翌年,我国本土英语报刊*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字林西报》)11月刊登的“Influenza Research Progressing: Mouse Found Susceptible to Virus”一文就介绍了这一传染病研究新进展,称流行性感冒的病因为一种“filter-passing virus”^⑤。此后不久,西医“病毒”概念随包括“滤过性病毒”在内的一系列新词进入汉语世界。

《清华周刊》发表“病毒之化学性质”一文,开启了“病毒”知识翻译的新篇章。该文指出:“病毒是一切动植物致病之由,它与一般的微菌不同,体积小至能通过沙滤器之空隙处,通常显微镜是看不见它们的(禹 1936:46)。”该描述清晰地将“病毒”区别于“细菌”。文章进一步介绍:“从最近的许多文章中看来,好像烟草摩西病(mosaic disease)病毒的化学成分研究成绩最好(同上:46-47)。”可见此等知识翻译并非从原语文本到译语文本的直接转码,而是对外来知识进行的整合、加工及转述,当时知识翻译的主体确切地说应是“译述者”。^⑥

此后,“病毒”与“virus”的对译在汉语报章中逐步普及。《时事类编》刊登“预防病毒病症(Virus disease)的新希望”,该文开篇即介绍道:“对于小儿麻风症(infantile paralysis)、流行性感冒(Influeunza)以及其他因病毒(Uirus)而生之病症,其预防或制止方法,基于最近之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可望完成(佚名 1937:95)。”标题中的“virus disease”证明此处的“病毒”即指现代“病毒”,而行文中诸如“Influeunza”“Uirus”等拼写错误也多少反映了时人在知识建构过程

中对相关概念的把握需要一个认知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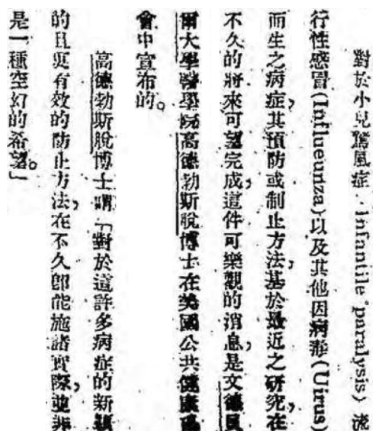


图5 “预防病毒病症的新希望”一文中“influenza”和“virus”的拼写错误

或是出于消除歧义的考虑,在这一现代“病毒”专门知识建构的主要时期,相关知识翻译者使用了一系列较“病毒”二字更为具体的语词来指称这一新概念,如“病毒微生物”“滤过性病毒”“可滤的病毒”“滤病毒”“超视微生物”“微如斯”等。1938年《上海医事周刊》刊登的翻译短文“病毒病与病毒微生物”显示了“病毒微生物”这一说法,文中介绍了“用过滤法……及沉淀法,可知病毒微生物之体积”(佚名 1938:3)。

20世纪40年代初刊于《战时医政》的“滤过性病毒论”(Herzberg 1941)及《医药导报》的“滤过性病毒”(庄思斋 1941)是该时期系统引介现代“病毒”概念的典型文本。前者为面向专业读者的译文,后者则是面向大众读者的科普文章。刊于《科学画报》的“可滤的病毒”(孟德 1943)显示了“滤过性病毒”的另一说法。刊于《医药学》的“滤病毒(微如斯)Virus”(黄兰言 1947)给出其另外两则译词,“滤病毒”为“滤过性病毒”之简称,“微如斯”则是蕴含“病毒”体积微小之意的巧妙音译(见图6)。

5.5 翻译概念“病毒”的确立

上述报章文献所提供的例证显示现代“病毒”概念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汉语确立,当时已出现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有关西医“病毒”知识的介绍,内容涵盖“病毒”与“细菌”的区别、“病毒”的命名及其历史、特征和传染原理以及以“病毒”为病原的传染病等。20世纪中上叶有关微生物学知识的专著及译著进一步显示,作为翻译概念的“病毒”于1940年前后,随“病毒”知识的系统性建构,确立于汉语医学场域。孟合理(1934:56)在其所编的《医学用语简易读本》“传染病”部分中指出:“传染病的毒强半是细菌(bacteria),也叫微生物(microbes),还有没有认出来的微小东西。”可见“细菌”与“微生物”在当时仍为近义概念,而“病毒”则仍“没有被认出来”,故而这一概念也尚未确立。

濾 病 毒 (微如斯) Virus

濾病毒為病原體之發見

自大師柯赫發見細菌為病原體後，其門弟子莫不悉心研究各傳染病，希發見新病原體各得其根源，而可澈底撲滅，以當時之發明，多靈氣之盛，似乎舉世人皆傳染病咸可得其病原體，而立得撲滅之方。奈事與願違，自然界之事物，并不能如理想之單純，有好多傳染病，雖明知其為接觸傳染，而根究病原體，則累歲經年迄無，所獲者亦不一而足，與高采烈之舉人，受此挫折而垂頭喪氣者多矣。

譬如家畜（牛馬）之蹄疫及唇疫（俗名馬唇瘡）患處（唇或舌）所生之大泡，其泡中液，如發於其他健康家畜身上，無不立刻傳染，是其為傳染病，毫無可疑，而其病原體，即大量存在於此等泡液中，亦毫無可疑，乃置此液於顯微鏡下檢查之，毫無所見，又置此液於各種培養基中培養之無菌發生，亦毫無所見，劉夫來者Loeffler 柯赫之高足弟子也，所發明各種染色法，至今為學者所稱，當一八八七年時，實受命為此種馬唇疫病原體之追求，當時即深為此種奇異事實所困苦。

尤奇異者，向來所用以濾細菌液之細瓷濾過器，為一切細菌所不能通過者，此毒液之毒，獨能通過，緣此濾器之瓷，細密達於極點，任何微小細菌，均為所格，故通過之液，即完全無菌，再試培養，即毫無發生，試以之接觸於生物，亦毫無傳染，獨此種馬唇疫之泡液，經過過後，其濾出之液，仍富於傳染性，可見其中實含有生物，但此生物，較極細之細菌為細，故能通過濾過器，而為數千倍顯微鏡所不能窺見。

图6 1947年《医药学》杂志中译作“濾病毒”和“微如斯”的“virus”

陈雨苍(1936:13)著的《简师简乡师:卫生(第二册)》是较早提及“滤过性病毒”的汉语书籍。该书对其介绍见于第二篇第一章“疾病概论”,可谓言简意赅:“凡细菌原虫或超视微生物(又名滤过性病毒)侵入人体,增殖发育,并产生毒素使人体中毒的,就叫作传染病。”Zinsser 和 Bayne-Jones(1939:829)的《秦氏细菌学》则是较早对现代“病毒”概念加以系统介绍的汉语书籍,书中第六篇“滤过性病毒所致之病,疹,及一切未明原因之疾病”的“总论”部分即介绍了这一“用显微镜于寻常映光法所不能见,寻常培养基所不能生长而可滤过于瓷滤器(filter)之病原”,称“此种病原尚无适当之名,姑定为滤过性毒,或超视病毒(filtable viruses,ultramicroscopic viruses)”。

6. 结语

1940年前后,随着“virus”概念及其译词确立,“病毒”知识翻译中的语言转换过程基本完成,“毒”“浆”“病菌”“滤过性病毒”等各具特色的译词均参与其中。与此同时,“病毒”话语步入翻译概念形成期,与“virus”概念完全对应的新知在各类书刊中呈现给本土读者,现代“病毒”知识的建构到达高峰期。可以说,“病毒”知识翻译中的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和知识建构是相互包含的关系,译词的更迭反映在新知与旧识的遭遇与交融中,翻译概念的形成与确立则推动了译词的标准化。不同阶段的话语塑造也反映出知识建构由旧识向新知、由笼统知识向专门知识转变的总体趋势,而“病毒”知识的系统性建构又反过来使“病毒”一词语义发生“窄化”。随着“病毒”具体为一则与“细菌”“原虫”等同属致病微生物范畴的独立概念,“旧医”与“新医”的差别得以彰显,我国医学之现代性也随之显现。

西方医学起初也只是地方性的知识体系,随着西医向异质文化的成功输出,地方性知识才得以逐步成为世界性知识。现代“病毒”概念在我国的确立正是这一过程的缩影,其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及知识建构映射出西医知识在我国生产与再生产的模式。在“西医东渐”的浪潮下,“病毒”知识随大量涌入的西医知识进入汉语世界,新的“病毒”概念将旧传统区别于新知识:传统医学所谓之“毒”的笼统、含糊和现代医学“病毒”概念的具体、精确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区别于细菌、真菌、原生动物等其他微生物,并且可再细分出诸多种类。本文所探究的知识翻译实践促成了现代性的发生,而与现代“病毒”相关的知识翻译仍在继续。

近年新冠肺炎全球爆发期间,“无症状感染者”“健康带菌者”等术语进入国人视野。其中,“健康带菌者”这一说法即“病菌”“病毒”相关知识在当代汉语语境下“再生产”的产物:英语中的“asymptomatic carrier”对应汉语中的“无症状感染者”,而“健康带菌者”则是后者的另一说法,在英语中没有专门的对应词汇。字面上看,“健康带菌者”和“asymptomatic carrier”是不对应的,前者将“病毒”排除在外,但在内涵上,“健康带菌者”也包括体内携带艾滋病、肝炎、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病毒的健康人。20世纪中叶“病毒”概念的确立并非“病毒”知识“再生产”的终点。通过这个例子得以看出,医学知识的翻译也非简单的“来料加工”,几乎涉及了知识翻译学的语言转换、话语塑造和知识建构的三大层次。

附注

- ① 以熊月之(2011)对晚清“哲学”知识翻译的考察为例,当时的“哲学”话语塑造始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随后经历了从旧识到新知的误解与曲解、新概念的“正名”以及新名词、新概念的确立。
- ② 本文图示均选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英华字典”数据库、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数据库”及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的文本影像。
- ③ 该文见1880年的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作者佚名。
- ④ 鼠疫的病原为“鼠疫耶尔森菌”,梅毒的病原为“斯皮罗查特细菌”,疟疾的病原为“疟原虫”(罗伊·波特 2022:401-402)。三者在微生物分类上均不属于病毒。
- ⑤ 该文见1934年的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作者佚名。
- ⑥ 在“晚清西学丛书”的总序部分,周伟驰将晚清西学翻译分为甲午战争前的“译述时期”和维新变法失败后的“转译时期”,对当时西学著述的翻译模式加以区分,而报章文献显示,20世纪中上叶的医学知识翻译活动仍以“译述”为主要策略(可参见周伟驰 2018)。

参考文献

- Foucault, M. 200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M].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Herzberg. 1941. 滤过性病毒论(钱家骏译)[J]. 战时医政 3(8-9):12-21.
- Said, E.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M].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insser, H. & S. Bayne-Jones. 1939. 秦氏细菌学(汤飞凡译)[M]. 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
- 陈侣华、陈丽云. 2021. 传教、传医、传科学:近代中国教会医院之发展[J]. 医学争鸣(6):49-54.
- 陈雨苍. 1936. 简师简乡师:卫生(第二册)[M]. 南京/上海:正中书局.

- 辞典编译委员会. 1949. 英汉新医辞典[Z]. 杭州:新医书局.
- 丁惠康. 1931. 自然的及接触的病毒[J]. 新家庭 1(5):46-55.
- 方维规. 2000. 东西洋考“自主之理”[J]. 中外法学(3):257-276.
- 冯天瑜. 2006. “封建”考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高似兰. 1908. *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 [Z]. 上海:中国博医会.
- 高晞. 2021. 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4-104.
- 顾鸣盛. 1908. 花柳病之传染病毒说[J]. 医学世界(5):30-35.
- 赫美玲. 1916.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官话)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Z].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 黄河清. 2020. 近现代汉语辞源[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黄兰言. 1947. 滤病毒[J]. 医药学复 1(6):27-28.
- 黄士复、江铁. 1928. 综合英汉大辞典[Z]. 上海:商务印书馆.
- 黄兴涛、刘鹏. 2020. “细菌”“病毒”概念的传播与中国现代卫生防疫观念的兴起[N]. 光明日报(04-20):14.
- 金观涛、刘青峰. 2009. 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 北京:法律出版社.
- 邝其照. 1899. 华英字典集成[Z]. 香港:循环日报.
- 李登辉、郭秉文、李培恩. 1946. 双解实用英汉字典[Z]. 上海:商务印书馆.
- 李瑞林. 2022. 知识翻译学的知识论阐释[J]. 当代外语研究(1):47-59, 161.
- 鲁德馨、孟合理. 1949. 高氏医学辞汇[Z]. 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
- 罗存德. 1866. 英华字典[Z]. 香港:The Daily Press Office.
- 罗伊·波特. 2022. 剑桥医学史(张大庆等译)[M]. 南京:译林出版社.
- 孟德. 1943. 可滤的病毒[J]. 科学画报 9(10):595-596.
- 孟合理. 1934. 医学用语简易读本[M]. 上海:中华医学会编译部.
- 缪蓬. 2018. 医学概念系统的“跨语际”旅行——19世纪初牛痘接种术在我国本土的传播与接受[J]. 山东外语教学(6):33-39.
- 缪蓬. 2022. 晚清民国癌症概念的翻译及流变[J]. 医学与哲学(3):74-78.
- 庞秀成. 2022. 知识翻译学的译者个体知识与求知模态[J]. 当代外语研究(1):72-82.
- 秋水. 1914. 法国贝士多疗病院二十五年之纪念史[J]. 进步 5(4):48-55.
- 屈文生. 2012. 一项关于近代“宪法”概念史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若干法律辞书为考察视角[J]. 贵州社会科学(7):42-46.
- 覃江华. 2022. 翻译与知识生产、管理和转化——知识翻译学刍议[J]. 当代外语研究(1):60-71.
- 汪侗然. 1935. 综合英汉新辞典[Z]. 上海:世界书局.
- 魏励. 2018. 常用汉字源流字典[W].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吴建庵. 1949. 袖珍医学辞典[Z]. 上海:广协书局.
- 吴治俭、胡治毅. 1935. 袖珍英华字典[Z]. 上海:商务印书馆.
- 熊月之. 2011. 从晚清“哲学”译名确立过程看东亚人文特色[J]. 社会科学(7):138-145.
- 颜惠庆. 1908. 英华大辞典[Z]. 上海:商务印书馆.
- 杨枫. 2021. 知识翻译学宣言[J]. 当代外语研究(5):1-2.
- 杨枫. 2022. 知识翻译学的翻译定义与分类[J]. 当代外语研究(1):1-2.
- 佚名. 1908. 疟疾(续)[J]. 1908. 医学世界(3):13-20.
- 佚名. 1938. 病毒病与病毒微生物[J]. 上海医事周刊 4(51):3.
- 佚名. 1928. 狂犬病毒之奈格里氏小体得以明了检出之简便迅速法[J]. 中华医学杂志 14 (1):38-39.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Western Anglophone world might shed light on the reception studies of translate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s well as the projec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in future.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reception studies;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上接第 32 页)

佚名. 昆虫之媒介病毒[J]. 1934. 医事公论(14):23-24.

佚名. 身体与病毒[N]. 1928. 美亚期刊(04-01):3.

佚名. 预防病毒病症的新希望[J]. 1937. 时事类编 5(3):94-96.

佚名. 1906. 黑鼠病毒[N]. 1906. 盛京时报(12-2):3.

逸民. 1925. 苍蝇传带病毒之原因[J]. 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159):12.

禹. 1936. 病毒之化学性质[J]. 清华周刊复 4(7):46-47.

张大庆. 2019. 返老还童:性腺移植术在中国的传播[A]. 陆康、张柏春. 旧学新知——中欧知识与技术之演变[C]. 北京:中华书局. 220-230.

章清. 2019. 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伟驰. 2018. 总序[A]. 威廉臣. 格物探原(张洪彬 校注)[C].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1-27.

庄思斋. 1941. 滤过性病毒[J]. 医药导报 4(6):31-35.

(责任编辑 邓梦寒)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on Virus Sinc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knowletology, by MIAO Peng.

Abstract: Transknowletolog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an China typically reflect the relation between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discourse formulation,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knowledge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lation of knowledge on "virus" during the said period and various texts from dictionaries,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books, this article reviews specific cases of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examines discourse formul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outlines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on "virus" could be viewed as a tru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in China, as well as China's medical modernization driven by the translation of such knowledge.

Key Words: transknowletology; translation history; virus; term translation; discourse formulation